

本报记者刘荒

在中国制造业版图上,浙江省浦江县尚有一席之地——水晶、挂锁和绗缝三大传统支柱产业,均占全国同类产品六成以上市场份额。

但囿于市场规模、产业层次和管理水平,又毗邻“世界小商品之都”义乌,它们并未给当地带来更响亮的名声。

10年前,一场发轫于浦阳江污染治理的环保风暴,将浦江推到全省“五水共治”(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)战略最前沿。污染严重的水晶产业首当其冲,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有。

仅三年半时间,全县水晶企业(含家庭作坊)由2.2万家骤减至526家。除近百家厂房手续齐全外,其余全部入驻由政府投资的浦江县水晶产业园区(以下简称水晶园区)。

紧接着,浦江县转换角色再破题,引进民间资本开发挂锁产业园区(以下简称挂锁园区),并将园区招商、运营和管理都交给对方,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产业集聚升级。

10年破局之旅,重在政府职能归位:从出手整治污染到放手开发园区,可见“有形之手”进取有力、退让有益,对重塑生态与业态关系,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,具有独特的实践作用和启示意义。

本报记者曾两赴浦江,一探究竟。

既丢“面子”又输“里子”的水晶

浦江因境内浦阳江而得名,置县史逾1800年,独具“万年上山、千年郑义门、百年书画兴盛地”的人文底蕴。

1984年秋,虞宅乡马岭脚村的几位村民,在四位辗转而来的上海师傅指导下,创办了浦江首家水晶玻璃装饰品厂。

一时间,虞宅乡及周边农民闻风而动,家庭小作坊遍地开花。这些靠切磨、抛光玻璃珠起家的农民,竟打造出一个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,还摘得“中国水晶玻璃之都”的桂冠。

“扛一麻袋玻璃珠去广州,就能换回一麻袋人民币!”这个流传甚广的“硬核”致富故事,按当年流通货币的面额算并不夸张。

随着人气和财富的聚集,这个野蛮生长的草根产业,衍生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链,变成“尾大不掉”的治理难题。

高峰时期,浦江38万本地人口与水晶业相关者过半,外来从业人口高达20万人。一些水晶专业村的加工大户,每年收入数百万元已不在话下,连夫妻店都能赚上一二十万元。

虞宅乡新光村200多户人家,一下子冒出316个水晶加工户——村民大多进城或外出做生意,把空房子租给外来户加工灯饰挂件、饰品配件……全村房租年收入上千万元,外来人口一度达1800多人,超过留守儿童9倍还多。

曾几何时,这个浦江最大的富民产业,竟沦为头号污染源——每天直排1.3万吨水晶废水、600吨水晶废渣,加上印染、造纸等污染,导致县域85%的河流变成“牛奶河”“垃圾河”“黑臭河”,几乎将浦江的自然生态推向绝境。

居民深受其害,怨声载道:“别说下去游泳,连洗脚都嫌脏!”还有人把一桶桶污水泼到政府机关门口抗议。

“当年浦江的癌症发病率,在金华地区是最高的。”2021年6月,时任水晶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张坚兵向记者回忆说。

这种“坐在垃圾堆上数钱,躺在病床上花钱”的悲剧,凸显当地水晶产业畸形发展之殇。浦江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,曾连续6年全省倒数第一,上访率连年居高不下。

浦阳江是钱塘江上游一级支流,浦江出境水质长期污染超标,屡遭下游市县诟病。

2009年7月,浙江省实施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考核。浦江因连续两个年度考核不合格,被列为全省“挂牌督办”和“区域限批”县,并处罚金200万元。

2011年,浦江连续承办6届的中国水晶及玻璃制品博览会,也被不声不响地停掉了。由于水晶产业效益大幅下滑,企业欠薪案件频发,已占全县同类案件一半以上。

扬汤止沸,不如釜底抽薪。既丢“面子”又输“里子”的浦江,痛下决心铁腕拆违治污,倒逼水晶产业转型升级……

治污最大的战法是依法

浦江水晶污染由来已久,历届政府都想有所作为。

这个外界看来并不起眼的产业,对浦江而言则举足轻重——既关系几十万人的生计,也牵动县域经济增长。

在治污呼声与水晶利益之间,当地官员难免踌躇不前。而最难缠的是隐蔽的关系网,还有“唯GDP政绩观”。

「出手」有力 「放手」有益

从一个浙中小县产业集聚升级看政府职能归位



▲图为浦江郑宅万洋众创城全景。 受访者供图

是县人大代表,照样被关停;仅用5天时间,就拆除了饮用水源区背景复杂的“最牛别墅”。

据浙江在线2014年9月报道,浦江对94名党员干部采取强制措施,对284名企业主实施行政拘留,9名县人大代表被追究刑事责任。依法治污力度,可见一斑。

2022年7月,浦江连续八年荣获“五水共治”优秀县,再夺“大禹鼎”金鼎。这个2019年荣膺中华环境优秀奖的小县城,被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·索尔海姆盛赞“是未来中国甚至世界的模样”。

同年深秋,记者在永康市郊一间简朴的书房里,见到刚从浙江省“五水共治”办公室副主任岗位退休回乡省亲的施振强。

追忆“无论多么惨烈,这一仗必须完胜”的浦江治水历程,尤其那些细节难以言说的故事背后,诸多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压力与担当,听起来依然壮怀激烈,令人动容。

这位崇尚“事了拂衣去”的退休官员,书桌上仍摆放着厚厚的几大本书稿清样——他刚刚整理出来的工作日记,包括浦江十年的点点滴滴,难掩其内心深处的浦江情结。

谈到依法治水,施振强的体会更深,“要敢于用法、善于用法,依靠法治的正气加硬气整治污染,不光干部有底气,群众也服气。”

产业集聚并不等于升级

浦江治水之初,人们对“水晶之都”何去何从心存疑虑,担心水晶产业就此一蹶不振,甚至偃旗息鼓。

其实,即使不搞大规模污染整治,长期停留在低水平阶段的浦江水晶,也到了产业升级的最后关头。

“技术含量低,产品同质化,相互压价没完没了,搞得整个行业都没利润。”浦江县发改局副局长陈光明回忆说。

一些水晶加工户还记得,早先磨一颗八角水晶珠赚1毛多,后来卖一颗才六七分,扁珠也从每颗卖1元掉到1毛了。

由于市场秩序混乱,原料以次充好、质量鱼目混珠等乱象丛生。任其发展下去,浦江水晶难逃死路一条。

只有升级才有转机。2012年9月,浦江摘掉“区域限批”的帽子,从省里争取到500亩用地指标,按照“园区集聚、统一治污、产业提升”的思路,启动水晶产业生态集聚区工程。

与涅槃重生的生态环境相比,水晶产业断臂之痛的代价也很惨重:半年间,外来加工户流失7.7万人,用电量同比下降15.6%,日均水晶发货量减少近500柜……

“很多企业跑到外地去了,有能力跑的又都是大的。”张坚兵深有感触地说,回过头来看,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

然而,最令人称道的是,这个事关当地几十万人利益的铁腕治污,却未引发一起县上访和群体性事件,足见公道自在人心。

2017年,浦江水晶迎来高光时刻:总投资19.3亿元的水晶园区投入运营,428家水晶企业,分别入驻东部、南部、西部和中部等四个“扩编”的集聚园区。

这些外观“高大上”的园区,彻底改变“低小散”的产业格局,也使浦江县水晶产业提升目标更加雄心勃勃——

当年春天,浦江县与中国华信签订投资协议,投资53亿元打造水晶小镇,建成后水晶制品业收入可达百亿元;同年12月,浦江水晶产业改造提升实施方案出台,预计到2020年水晶业总产值逾150亿元,力争上市公司2家(含主板1家)。

挂锁产业找到“新钥匙”

上世纪70年代,浦江挂锁产业从国营唐灯锁厂起步。

改革开放后,在锁厂学到手艺的工人,纷纷办起挂锁加工作坊——以郑宅镇和中余乡为中心,建成拥有

方米2100元的限价政策。

“若既不拍地又不交保证金,企业就要关停。”吴秉宇说,不像有的地方只堵不疏,当地挂锁企业尚有可选空间。

浦江县丹翔锁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贤杰以每亩84万元的价格,拍到西部挂锁园区一块土地,共投资1200多万元建厂。

此前,他也考虑过买万洋厂房,还跑到建设工地考察,后来“感觉比较贵,还很拥挤,怎么都不划算”。

与之相反,浦江县东昌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翁东明在西部挂锁园区拍地时,也交了几十万押金。后来又觉得地价过高,就联合20多家中余企业,购买了万洋的厂房。

“当初万洋投入5个多亿,做完一期项目后,财务收支基本就打平了。”王浩强对记者补充道。

政府有为是让市场更有效

显而易见,与政府包揽的水晶园区模式相比,万洋挂锁园区运营成本低、效率高,释放出更强的市场经济活力。

基于经验也限于财力,浦江小微园区更加开放。短短几年,民间资本纷入局中。

浙江吉成实业有限公司进驻白马镇,投资画框产业为主的吉成产业园;万固实业集团立足黄宅镇,兴建主营文体用品的恒固创艺园。

“以前招商是项目选我们,如今我们用小微园选项目。”白马镇党委宣传委员郑彬峰说。

“现在把厂房转手,每平方米能赚1000元。”翁东明颇为得意当初的选择。

不过,靠投资厂房获利,既不是扎根实业者的目标,更不是地方政府期望的结果,但厂房热足以说明实体经济富有韧性。

“若想转手厂房,买方要符合主导产业要求。”浦江县经济商务局技术改造科科长杨叔鹏解释道。

随着挂锁逐渐被国内市场淘汰,不少挂锁企业转向非洲和中东市场,缺乏向智能门锁转型升级的能力。加之产品利润微薄,挂锁园区业态多元已成定局。

当地多位受访官员证实,水晶园区也考虑过卖给民营企业,彻底化解隐形债务,但县里有不同声音。因担心民间资本进入改变业态,这个方案最终未获通过。

“把企业集聚到园区并不是目的,要通过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,鼓励发展壮大的企业到园区外落地。”陈光明说。

业内人士指出,产业转型升级成败与否,要靠市场竞争来决定。小微园区作为产业升级的孵化器,无法充当企业兴旺的保险箱。若将一些衡量区域或产业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,生搬硬套到每一家企业头上,无异于将激励变为束缚,也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。

而一些基层官员坦言,一旦被困在这些刚性指标系统之中,放手就等于失去抓手,具体工作难以推进。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,需要相应的能定位和评价体系来保障。

郑宅镇常务副镇长魏亮认为,由政府主导园区掌控更全面,办事效率更高;民企主导服务职能更多,平台整合能力更强。现在园区产业集中了,企业亩均效益还未体现出来。

“对规上企业奖励力度比较大,要素保障充分,不会拉闸限电,政策有延续性。”他还列举出小微企业合并入规的诸多好处。

郑俊俊也向记者表示,如果政府有钱还会继续投资园区,但要核算成本收益,会考虑把一些产权卖给企业。

在杨叔鹏看来,按照县里平均每10亩土地1家规上企业的供地标准,东部挂锁园区得有40家规上企业,“只能说是一个富民园区,对财政税收没有太多贡献”。

一些官员担心,开发商园区招商只追求效率,忽略企业质量,若几年后甩手走了,会给政府留下一摊烂事。

目前,浦江县已逐步提高开发商的厂房自持比例,将开发商与小微园区深度绑定,用以保证后续经营管理。

以万洋、吉成为代表的开发商,则更愿意把园区当作一门长远生意。“开发阶段稍微有些盈利,主要靠后期运营管理赚钱。”浦江吉成产业园项目总经理翁明亮说,不仅需要提供金融与企业服务,还需要引导园区内产业链协同发展,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赋能。

无论转型升级还是做大做强,都不会一蹴而就。地方政府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有为之举,关键在于促进和保障市场有效,并不是对市场主体设置更多的绩效指标。

去年12月16日,浦江县首家A股上市公司——浙江丰安齿轮股份有限公司登陆北交所。这个专注齿轮制造的农机企业“破圈”而出,恰恰说明市场作用至关重要。

(完)文豪对本文亦有贡献)